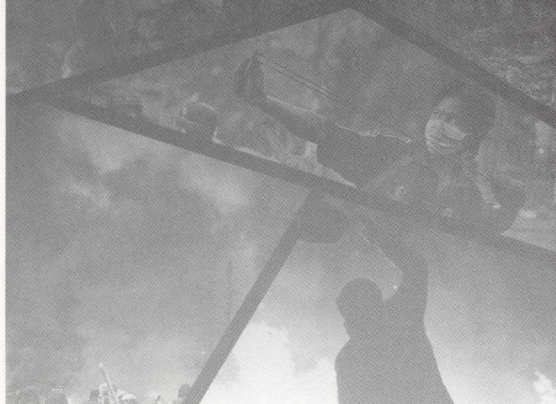


Comparative Politics Series



比较政治学丛书
丛书主编 李路曲



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

——以乌克兰和泰国为例

叶麒麟 著

Social Cleavages, Weak Party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Ukraine and Thailand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014030275

D751
11

CPS 比较政治学丛书
丛书主编 李路曲

华侨大学政治学学科重点建设项目

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

——以乌克兰和泰国为例

叶麒麟 著



D751
11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航

C17171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以乌克兰和泰国为例 / 叶麒麟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4

(比较政治学丛书)

ISBN 978 -7 -5117 -2076 -4

I. ①社…

II. ①叶…

III. ①民主政治 - 研究 - 乌克兰②民主政治 - 研究 - 泰国

IV. ①D751.130②D733.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9513 号

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以乌克兰和泰国为例

出版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薛晓源

责任编辑：侯天保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39(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5(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199 千字

印 张：11.75

版 次：201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6.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序言

回到政治常识

直面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是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天职。基于此，四年前在叶麒麟和我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就把当时正处于政治动荡中的泰国和乌克兰作为研究对象，因为我们深信，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动荡是结构性困境，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当然，这样的比较研究的难度也是可以想象的，叶麒麟博士迎难而上，以其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很强的研究能力按时完成了读者所见到的这本博士论文。

时隔四年，当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问题不但没有什么好转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中产阶级代表的泰国民主党变成了反对民主政治的主力军，泰国政府基本被瘫痪，这实在是世界民主史上的大笑话——民主党反对民主！乌克兰则因为种族矛盾，长期的街头政治最终变成了血腥暴力。

比较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转型进程本身首先是一种知识贡献。我们知道，学问要么是知识上的贡献，要么是思想上的贡献，当然后者更难些。其实，即使是知识上的贡献，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被大量虚假的知识所侵扰。因此，提供新知识本身就是学术贡献。新知识并不是一个国家基本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基于认识论基础上的材料加工和选择，其中少不了必要的方法论，而比较历史方法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考性知识。比如，国内关于泰国民主化进程的研究并不少，而乌克兰研究相对就少得多。泰国的问题如果说是阶级矛盾，而乌克兰则是民族矛盾。无论是阶级问题还是民族问题，都是社会结构问题。这样把两国加以比较，就有了共同的分析变量即社会结构，亦即社会结构与政治转型的关系。基于社会结构的政治转型比较研究，所得出的观察和洞见自然是一种精加工的知识。

更难得的是，叶麒麟博士还给我们提供了新鲜的思想养料。社会结构本

身不会行动，行动者是基于社会结构之上的政党组织。作者发现，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政党政治，泰国和乌克兰属于弱政党政治，即政党的制度化水平低，政党与其说是政党组织，不如说是临时搭伙而成的一般性社会组织，因此政党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都有待提高。弱政党政治直接影响了两国的政治转型。这样，“弱政党政治”就成为连接社会结构与政治转型结果的中介机制。寻求因果关系之间的中介机制，正是社会科学的新使命和新方向。

当然，在政党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上，理论讨论的空间依然很大。社会结构是政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反过来政党政治又会强化既有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现明显，比如印度的政党产生于地区和族群，而选举中的政党政治又强化了古老的族群政治生态。因此，即使是强政党政治，并不必然意味着好的民主或者顺畅的民主巩固。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正是比较政治研究的意义所在。在社会科学和思想界，因为研究范围上的局限，很多地方性知识变成了所谓的普世性知识。比如萨托利说两党制有利于稳定而多党制不利于稳定，就是基于欧美而言的地方性知识，但是国内政治学界视之为普遍现象，其实，很多国家的多党制反而有利于政治稳定，比如印度尼西亚。

比较研究泰国和乌克兰的政治转型，能给我们很多智识上的启发和感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常识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回到常识层面讨论问题。与本题相关的政治常识有哪些？

其一，政治学学科的常识。中国政治学已经恢复 30 多年了，从最初的“六论”政治学（阶级论、革命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民族论）到今天最时髦的量化政治学，“六论”似乎太土了、过时了。真的如此吗？政治学说到底就是研究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问题，国家建构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难道不是阶级关系？难道不是民族关系？难道不是政党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熟知的现代政治学经典著作，都是对这些基本关系娴熟把握的结果，比如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和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不要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这些过时了，运用最新方法而研究的最新问题比如民主化研究，还没有能与这些著作相媲美的。原因很简单，衡量社会科学的最高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能回到我们身处其中、并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来的。而“六论”就是关于社会结构问题的。因此，当我们的政治学在方法论上求新求异的时候，切不可忘记这些最基本的常识。不是吗，泰国的问题是阶级政治，而乌克兰的问题是

民族政治。

其二，关于民主性质的常识。我们关于民主的知识到底是太多了还是太少呢？实在是难以回答的简单问题。但是，关于民主的常识值得澄清。时代到了今天，有谁还反对民主呢？如果把民主当做公共善，任何人都不能、也不会反对民主。但是，我们所呼吁的民主和被教导的民主往往是工具意义上的，即民主制度或民主政体。既然是工具意义上的民主，理论上的民主的常识就需要得到重述。我们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意承认的是，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形式具有内在的冲突性。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早就告诫我们，无论是一人统治的君主制、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还是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都有内在的难以逾越的难题，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而引发的冲突和政体变迁。亚里士多德很有先见之明，过去如此，今天依然。道理其实很简单，作为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体，多数人内部就没有冲突吗？事实上不仅有，而且还很多。南美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最后不都是陷于民粹主义政治而难以自拔？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实现了，结果企业家用脚投票，国内经济出现问题了。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暴政”和密尔所说的“阶级立法”问题。

不仅如此，有了多数而排斥了少数的政治难道就是民主的？在中东地区，多数暴政则以教派形式表现出来，形成“永恒的多数”，既然赢家是教派的多数，选举有什么意义呢？结果是赤裸裸的暴力冲突。

因此，与君主制和贵族制一样，民主制也有其固有的问题，绝不能看上去是因为多数人统治就万事大吉了，就像我们曾经以为有了人民主权就万事大吉一样，结果出现了赤裸裸的侵害人权的政治。既然任何单一的政体都会有问题，西方自由民主运行得还不错的话，绝不是因为熊彼特—萨托利—达尔等人所论证的“选举式民主”，而是亚里士多德所归纳的最好形式的政体即混合政体，其中当然包括法治的第一位重要性，因为没有法治，任何政体其实都一样，民主制也绝不会比贵族制好。

这样，语境演变到今天，如果把民主笼统地等同于混合制或者是混合制的代名词，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如果把民主等同于“竞争性选举”而又赋予其太多的光环，这样的民主自然不被很多人所接受，因为竞争性选举的结果有目共睹，泰国和乌克兰的街头暴力还没有终止的迹象。遗憾的是，流行的民主观是后者。

其三，关于民主条件的常识。民主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民主政治本身就

会培养有利于民主的条件。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一联系到很多转型国家的现实，身处其中的学者和政治家大概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很多国家，作为现代政治的形式民主是很容易实现的，但现代政治强化的是固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比如印度强化的是碎片化族群政治，菲律宾强化了封建世袭制，结果永远不要指望有理想的治理。这且不说，像泰国和乌克兰这样的国家，选举民主强化了对立的社会结构，一个是加剧了阶级矛盾，一个是加剧了民族矛盾，甚至引发了作为民主前提条件的“国家性”问题。因此，谈民主还是不能忘记民主条件这个最古老的常识。可以说，不具备民主条件的国家实行的民主基本上都不是“好民主”，很多堪称“坏民主”，“坏民主”绝对不值得向往和追求。

不同于君主制和贵族制，民主是关于大多数参与甚至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实现条件自然比其他政体要多要高。原因在于，多数人内部有冲突，而且多数人还会排斥甚至迫害少数人。从历史上看，“好民主”都具备了同质性条件。我们已经很熟悉诸如民主的经济条件和公民文化条件等，以及还有什么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好等政体条件。这些固然都很重要，但是民主引发问题甚至冲突最多的原因则是民主出现在异质性结构中，即或者出现在贫富对立的两极社会结构，或者出现在民族仇恨的国家，或者出现在教派冲突的地区。民主是关乎多数人的政治，多数人如果分别处于对立或异质化结构中，冲突必然发生。根据世界民主化成败经验，民主的同质性条件至少有以下三个要素：

1. “国家性”。如今的国家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如果按照英国、德国、日本那样的一族一国，发展中国家将四分五裂，因此，研究民主转型的代表学者林茨等都把“国家性”即对同一个国家的认同，当做民主成败的前提条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主义的最有力评判者卡尔·施米特也是从这个角度谈论其民主同质性理论的。“民主制度显示其政治权力的办法是，它知道如何拒绝或排斥威胁到其同质性的外国人或不平等的人……在17世纪的英国部族民主中，平等基于宗教信仰的一致性。自从19世纪以来，平等首先存在于一个特定民族的成员之中，存在于民族的同质性中。”^①在施米特那里，同质性首先是指同一个民族，“民主首先要求同质性，

^① [德]卡尔·施米特：《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见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6页。

其次要求——假如有必要的话——消灭或根除异质性”^②。今天，后发国家与早发国家的最大不同之处是，早发国家的民主都是在施米特所指的同一个民族内进行，而后发国家则是多民族的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能说多民族不能搞民主，但至少有多元一体的“国家性”认同，即同质性不再是单一的民族性，而是国家性。

2. 共享信念。连自由民主的最有力论证者萨托利也这样说，没有政治观念上的共识，多党制是很危险的。确实，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管是什么党，哪怕是共产党，信奉的都是法治和以自由主义为基调的意识形态。因此，同质化条件至少包括一个国家中存在基本的至少是大概的共享信念。第三波民主化以来的历史是，很多国家恰恰是因为缺少共享信念而内斗不止。

3. 平等性。民主本身就是社会平等化的产物，因而平等性也是同质性的首要条件。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基于平等的社会自治本身就是人民主权的生动体现。在亨廷顿看来，美国是一个没有民主化而首先有社会现代化的国家，这个社会现代化就是平等。今天，很多失败的民主化转型就是因为社会结构的极端不平等。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里，民主不过是民粹主义的另一种说法。

第三波以后的民主化所以出现那么多问题甚至是泰国—乌克兰的国内冲突的根源，大概都可以从民主本身的冲突性质以及民主的同质性条件那里找到答案。民主本身是冲突的，而冲突性的选举式民主如果发生在政治信仰对立、主张一族一国的异质性国家或者社会结构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冲突是必然的事。道理很简单，民主本身是冲突的，而选举式民主更强化了冲突，因为在异质性国家，竞争性选举是以党派、信仰、民族为基础而展开政治动员的。

泰国和乌克兰的政治将走向何方？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两国的政治转型过程经典地演绎了常识的重要性。麻烦之处在于，常识就在那儿，就看你是否忘记常识，能否发现常识。

杨光斌

2014年1月25日 北京

^② [德] 卡尔·施米特：《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见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 | | |
|-----|-------|-----|
| 691 | | 附 录 |
| 811 | | 附录一 |
| 911 | | 附录二 |
| 821 | | 附录三 |
| 821 | | 附录四 |
| 761 | | 附录五 |
| 851 | | 附录六 |

目 录

| | |
|------------------------------|-------|
| 序 言 回到政治常识..... | 杨光斌 1 |
| 导 论 | 1 |
| 一、问题的缘起 | 1 |
| 二、研究综述 | 7 |
| 三、研究创新及难点..... | 23 |
| 四、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24 |
| 第一章 社会分裂与政党政治..... | 26 |
| 一、政党政治的社会整合面向..... | 28 |
| 二、政党政治的社会分裂面向..... | 33 |
| 三、在社会整合与分裂之间：政党政治之定位..... | 37 |
| 第二章 社会分裂与民主巩固..... | 44 |
| 一、社会分裂与民主巩固的逻辑关联..... | 45 |
| 二、“国家性”问题与乌克兰民主巩固 | 58 |
| 三、阶级对立与泰国民主巩固 | 81 |
| 四、社会分裂与民主巩固：乌克兰和泰国的比较 | 100 |
| 第三章 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 | 103 |
| 一、弱政党政治的民主政治形态 | 103 |
| 二、弱政党政治与乌克兰“国家性”问题 | 111 |
| 三、弱政党政治与泰国阶级对立 | 124 |
| 四、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乌克兰和泰国的比较 | 140 |

图表目录

| | | |
|--------|------------------------------------|-----|
| 图 1-1 | 政党政治的社会整合路线图 | 43 |
| 图 2-1 | 社会分裂与民主巩固的逻辑关联 | 57 |
| 表 1-1 | 李普塞特和罗坎的政党体制产生模式 | 28 |
| 表 2-1 | 民主巩固的各种界定 | 53 |
| 表 2-2 | 1991 年乌克兰总统选举投票结果的地域分布 | 66 |
| 表 2-3 | 1994 年乌克兰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 | 67 |
| 表 2-4 | 20 世纪 90 年代乌克兰的经济状况 | 69 |
| 表 2-5 | 1999 年乌克兰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 | 71 |
| 表 2-6 | 2004 年乌克兰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 | 74 |
| 表 2-7 | 2006 年乌克兰议会选举结果 | 77 |
| 表 2-8 | 2007 年乌克兰议会选举结果 | 78 |
| 表 2-9 | 2010 年乌克兰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 | 78 |
| 表 2-10 | 泰国历年贫困率概况 | 92 |
| 表 2-11 | 乌克兰和泰国民主巩固问题的比较 | 100 |
| 表 3-1 | 1994 年乌克兰议会党派的席位数 | 113 |
| 表 3-2 | 1998 年乌克兰议会党派的席位数 | 114 |
| 表 3-3 | 1998 年乌克兰主要议会党派支持率的地域分布 | 114 |
| 表 3-4 | 1998 年乌克兰单名制选举中各党派席位的地域分布 | 115 |
| 表 3-5 | 2002 年乌克兰政党名单制选举中议会党派的席位数 | 116 |
| 表 3-6 | 2006 年乌克兰议会党派的得票率和席位数 | 116 |
| 表 3-7 | 2006 年乌克兰议会党派支持率的地域分布 | 117 |
| 表 3-8 | 乌克兰主要议会党派议员的变动情况 (1998—2002) | 118 |
| 表 3-9 | 2002 年选举后不久乌克兰议会党派的席位数 | 119 |
| 表 3-10 | 在各国议会选举中至少获得 10% 选票的政党的平均年龄 | 126 |

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
以乌克兰和泰国为例

| | | |
|--------|------------------------------|-----|
| 表 3-11 | 2001 年泰国机构信任度调查结果 | 127 |
| 表 3-12 | 1995—1996 年泰国政党基层组织情况 | 129 |
| 表 3-13 | 1997 年泰国政党基层组织情况 | 130 |
| 表 3-14 | 泰国议员候选人转党情况 | 130 |
| 表 3-15 | 泰国在任议员转党情况 | 130 |
| 表 3-16 | 1975—2005 年泰国历届下议院大选情况 | 131 |
| 表 3-17 | 乌克兰和泰国政党政治的比较 | 141 |

导 论

即使政党的主体地位受到新社会运动、利益集团和大众媒体等其他政治活动主体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政党依然是自由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关键角色，依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有效的联系机制。

——〔英〕杰弗里·普里德汉姆 (Geoffrey Pridham)*

一、问题的缘起

众所周知，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则是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所谓“第一波民主化浪潮”^① 中的西方国家产生的，它们是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在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党被定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位置。政党政治正是通过利益综合、政治认同、组织竞选和政府治理等基本功能的发挥，借助政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使得自由民主政治生活得以运作和维系。因此，政党被视为选举政治的工具，政党政治被视为民主政治运转的轴承，是民主政体的实施机制，从而成为了当代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 Geoffrey Pridham, "Southern European Democracies on the Road to Consolidation: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the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Geoffrey Pridham (ed), *Securing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outh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3.

① 亨廷顿指出，在近代世界史中出现了三波民主化。每一波都有一些国家实现了民主化，而在民主化浪潮临近终点时则出现了民主的回潮，继之又是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具体而言，第一波民主化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时间为1828—1926年，而第一波回潮始于1922年的向罗马进军和墨索里尼轻易废除意大利民主，时间为1922—1942年；第二波民主化始于“二战”，时间为1943—1962年，而第二波回潮始于新型国家民主宪政的崩溃，时间为1958—1975年；第三波民主化始于葡萄牙结束独裁的政变，时间为1974年至今。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26页。

但是，随着人类历史进程推进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时，政党政治对民主政治上述的促进作用，不仅没有在前两波民主化时期那样明显，甚至还出现了“衰落”现象。美国学者艾伦·威尔（Alan Ware）指出，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政党政治的衰落主要体现在：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受到国家的干涉；随着现代媒体等科技和竞选技术的进步，现代民主政治更看重政党领导者或竞选者的人格特征，而较少看重政党的组织和纲领；政党未能提供大众在候选人提名、政党政策目标以及指导竞选活动等方面参与的机会和条件；党内民主仍难以捉摸；政党难以在对国家和对社会渗透之间求得平衡；新社会运动、利益集团和媒体等正在挑战政党在民主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及作用。^①另外，美国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和理查德·冈特尔（Richard Gunther）指出，在过去的20世纪的后四分之一时间里，民主正以令人始料不及的速度在全球蔓延着，政治自由达到历史新高，唯独民主形式的政府才能获得充分的合法性。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民主蔓延的同时，对具体的民主制度尤其是政党制度的不满和不信任却不断升温。不仅在工业发达国家，公众的政党依附（Partisan Attachments）不断衰减。在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政党依附甚至更弱。^②显然，在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交织进行的当今时代背景下，在许多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也出现了与那些旧民主国家相似的社会物质条件（如电视广播等公共媒体）和社会组织结构（存在大量的利益集团等社会组织），因而政党政治在这些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同样受到某些限制。无怪乎美国学者理查德·海因伯格（Richard Heinberg）提出了“政党终结”的论断。^③

不可否认，政党政治尤其是旧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衰落。但对于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衰落现象，我们应该清楚两点：第一，旧民主国家中的政党政治衰落是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已经定型和成熟的背景下的。第二，即使政党政治衰落，但政党依然存在，并没有终结。正如英国学者杰弗里·普里德汉姆指出，无论如何，政党依然是自由民

① Alan Ware, *Citizens, Parties and State: A Reapprais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6-228.

② Larry Diamond and Richard Gunther, "Introduction", in Larry Diamond and Richard Gunth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ix.

③ 详见 Richard Heinberg, *The Party's Over: Oil, War and the Fat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Gabriola Island: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5.

主政治生活中的关键角色，依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有效的联系机制。^①

相对于旧民主国家而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民主化转型正是由政党直接推动的。例如，墨西哥和台湾的民主化转型正是由主导型政党所推动的。此外，在美国学者胡安·林茨（Juan Linz）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看来，一个民主政体得以巩固需要具备五个场域（即条件）：“必须存在一个自由和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发展的条件；必须存在一个相对自主并且受人尊重的政治社会；必须有法律可以确保公民合法的自由权利和独立的结社生活；必须存在一个国家官僚系统，可供新的民主政府利用；必须存在一个制度化的经济社会。”^②除了这些场域之外，还需要“国家性”（stateness）作为先决条件。^③因而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民主之所以能够巩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林茨和斯泰潘同时也指出，“在巩固的民主之中，上述五个场域之间持续地相互协调，每个场域都恰好处于其他场域的影响力‘范围’之内。”^④另外，正如亨廷顿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在现代有着广泛社会动员与复杂经济体系的环境下，实现稳定政治统治（无论是威权统治还是民主统治）的效能最终决定于组织化的问责体系，而这种问责体系又取决于政党组织。”^⑤因此，被林茨和斯泰潘视为政治社会核心制度的政党制度，必然会影响到民主巩固的其他场域。对此，普里德汉姆等一些学者指出，政党政治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等部分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巩固过程中发挥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⑥但是从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现状来看，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乌克兰和泰

① Geoffrey Pridham, “Southern European Democracies on the Road to Consolidation: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the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Geoffrey Pridham (ed), *Securing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outh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3.

② [美]胡安·林茨等：《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③ 同上，第17页。

④ 同上，第15页。

⑤ 转引自[美]斯蒂芬·海哥德等：《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张大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19页。

⑥ 详见Geoffrey Pridham (ed), *Securing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outh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Herbert Kitschelt, et al (eds), *Post-Communist Party Systems: Competition,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arty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Hans Stockton, “Political Parties, Party Systems, and Democracy in East Asia: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4, No. 1, February 2001, pp. 94-119; 李路曲：《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国等其他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虽然初步完成了民主化转型，即初步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参与和竞争的选举民主形式，却由于严重的社会分裂，加之脆弱的政党政治又无法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以致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步履蹒跚，民主巩固仍任重而道远。就此而言，不能因为当代世界尤其是在旧民主国家中出现了政党政治衰落现象，而贬低政党政治理论的价值，轻视政党政治在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鉴于此，本书基于乌克兰和泰国的第三波民主化经验，着力阐述弱政党政治无法弥合社会分裂问题，从而影响到民主的巩固，并借此从反面来证明政党政治并不过时。

本书之所以选择处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乌克兰和泰国这两个国家进行案例研究，若就这两个国家本身而言，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1. 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分裂较为严重。社会分裂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的种族、宗教、性别、阶级、地域等群体之间的分殊和对立。乌克兰的社会分裂主要集中在东西乌克兰基于种族、宗教和语言之上的“特性”分裂。虽然1991年乌克兰宣布了独立，但由于历史和地缘战略原因，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国家认同危机，即“国家性”问题。大部分西乌克兰曾置于波兰和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之下，此地域的人口绝大部分为乌克兰裔并说乌克兰语。西乌克兰普遍视俄罗斯为威胁或负面影响，并且希望与欧洲和美国加强联系，即亲西方和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地位。相比较而言，东乌克兰曾是俄罗斯帝国的组成部分，此地域的人口大部分为俄罗斯裔并说俄语。东乌克兰更愿意与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而泰国的社会分裂主要体现在贫富差距导致的阶级对立。泰国的经济命脉主要掌握在城市中上层阶级手中，而广大农民和城市下层民众则处于贫困状态。2001年他信当选泰国总理后，推行“草根政策”，深得下层阶级拥护，但由于损害到中上层阶级的利益，因而遭到中上层阶级的抨击，2006年军事政变后被迫下台。泰国的阶级对立导致了下层阶级组织的支持他信的“红衫军”和中上层阶级组织的反对他信的“黄衫军”之间时不时的对峙。

2. 这两个国家的政党政治都比较脆弱。对于存在着严重社会分裂的国家而言，作为主要承担社会整合功能的政党政治尤为重要。但从经验现状来看，乌克兰和泰国的政党政治非常脆弱。一般而言，探寻政党政治作用强弱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从政党与国家（政府）、政党与社会、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等方面入手。乌克兰的政党的社会根基比较深厚，倾向于经济改革、亲西方和支持乌克兰国家地位的政党（如“我们的乌克兰”联盟）在西乌克兰有

着深厚的社会根基，而倾向于和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并维持前苏联经济体制中因素的政党（如乌克兰共产党）则在东乌克兰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但是，有着相对深厚社会根基的政党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则受到了乌克兰“总统一议会制”这一宪政体制的限制，从而未能发挥有效的作用。泰国的弱政党政治则主要受到威权主义的传统影响，政党的社会根基不深，政党仓促组建，转瞬即逝。“红衫军”所在的“反独裁民主联盟”只是一种社会运动组织，并不是政党组织，这足以说明泰国政党政治的脆弱性。

3. 这两个国家的第三波民主尚未巩固。在泰国，社会阶级对立，弱政党政治又无法实现社会整合，致使街头运动反复不断。加上军人不断干政和威权主义的传统，泰国的民主巩固步履蹒跚。在乌克兰，东西乌克兰的“特性”分裂，加之有效竞争和合作的政党制度的缺乏，致使作为民主巩固先决条件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国家性”问题依然未能解决。总之，弱政党政治致使民粹式的人格政治、庇护政治、派系政治和运动政治等充斥于这两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之中，以致无法对社会分裂进行有效的弥合。

简言之，仅就乌克兰和泰国本身而言，本书将这两个国家作为案例的主要原因在于，在这两个国家中，虽然社会分裂的内容、弱政党政治的原因以及民主巩固问题有所差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弱政党政治不仅无法弥合严重的社会分裂，而且还制造和加剧社会分裂，以致第三波的民主无法得到巩固。

另外，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表征，以竞争式选举（普选制）为基本特征的西方自由民主，较大规模地向非西方地区扩张。正是基于此，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①不可否认，自由民主所内含的自由、平等、权利和人民主权等，都是具有一定普适性的价值。自由民主凭借其保障和实现社会个体利益的功能，从而被视为当前民族国家重要的政体形式之一。在亚非拉等非西方地区中，自由民主往往被很多人视为摆脱政治以及社会发展困境、实现政治和社会进步的唯一出路。在中国，政界虽然也承认自由、民主等价值的普适性，却明确拒绝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可是，学术界和民间仍有不少人一直在期待和追求在中国施行西方自由民主。

然而，问题就在于，成长于西方社会土壤的自由民主是否可以完全照搬

^① 详见〔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